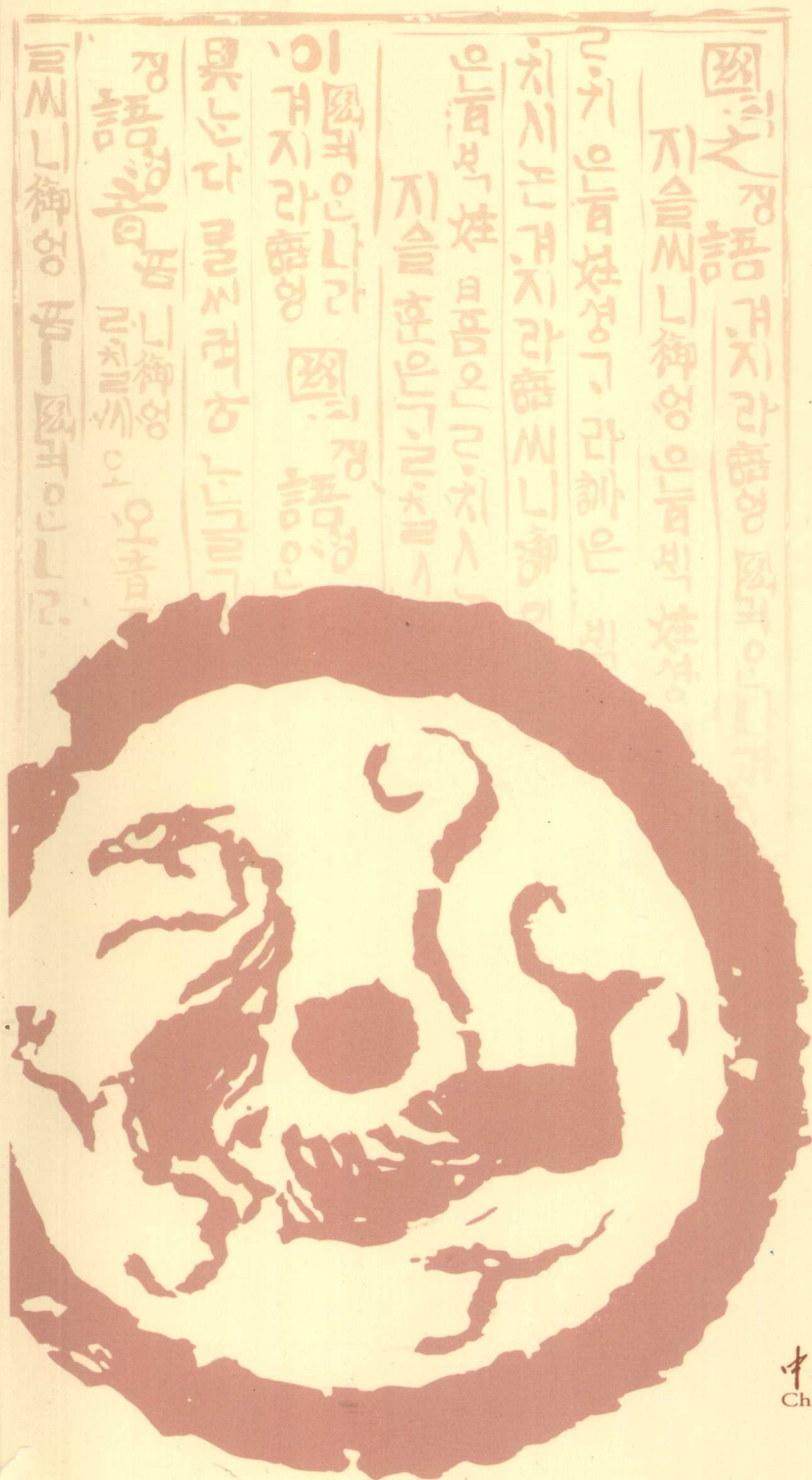




中韩文化交流丛书
中央民族大学朝文系 / 编

中韩宗教思想比较研究

○ 金京振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韩文化交流丛书
中央民族大学朝文系 / 编

中韩宗教思想比较研究

◎ 金京振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韩宗教思想比较研究/金京振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1108-820-5

I. ①中… II. ①金… III. ①宗教-思想-对比研究-中国、韩国 IV. ①B928.2②B928.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0776 号

中韩宗教思想比较研究

作 者 金京振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傲 腾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25.375

字 数 36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820-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是中央民族大学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建设项目《中韩文化交流丛书》之一，由韩国科学技术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共同主持的“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序 言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的友好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是 1992 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从经济贸易合作开始，已经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诸方面的全面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也不断达成很多共识，发挥其重要的区域性作用。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可靠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还有更广泛的合作空间。

中央民族大学朝鲜—韩国学研究中心和朝鲜语言文学系是北京的朝鲜—韩国学重要教学、研究基地，有着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与研究基础。曾于 2007 年向韩国科学技术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提出申请，参加“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建设项目”，并于 2008 年被选定为预备建设大学，2009 年正式定为“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这一项目是世界性课题，目前世界上只有 10 所大学参加，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华盛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荷兰雷登大学，中国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本中心致力于把本土朝鲜学与国外韩国学，包括海外的韩国学与当地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变异的韩国学结合起来，共同研究。以朝鲜语言文学为基础，对韩国学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艺术学、教育学等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范

围包括半岛韩国学（朝鲜学）和国外韩国学，以及海外朝鲜族同胞的韩国学研究。

在中国，研究和发展韩国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韩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解除各种误解和偏见，增进中韩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间的合作与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东北亚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本中心项目从2009年开始，项目期限为5年。在这个5年里，本中心将采取多种方式，如出版《中韩文化交流丛书》（15册），召开韩国（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举办韩国学年轻学者培训班、朝鲜族中学教师业务培训班、朝鲜—韩国学系列讲座，继续出版《朝鲜—韩国学研究》论文集等，以顺利完成中央民族大学海外核心大学建设中心五年计划建设目标。主要为以下两个目标：

1. 朝鲜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目标

朝鲜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是中国的韩国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朝鲜语言文学系在第11个5年规划中提出：与我校韩国语专业合作，建立北京市韩国学教学研究活动信息资料中心。即立足于中韩（韩中）语言对比、南北韩文学比较、中韩文学比较、海外朝鲜文学比较、中韩文化比较、翻译理论教学与研究，把中央民族大学朝鲜语言文学系逐步建设成中国的韩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中心。

2. 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建设目标

（1）以朝鲜—韩国学研究中心为基石，协同校内韩国学相关学科及研究所，共同建立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艺术学、教育学等领域的韩国学研究中心，并与其他大学和研究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全面推进韩国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韩国学研究核心大学。

(2) 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到中央民族大学朝鲜—韩国学研究中心,以壮大研究队伍,促进韩国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其中,《中韩文化交流丛书》(15册)是本中心重要研究课题,它们是:《走向新起点的中韩经济关系》(主编:赵晋平)、《中韩宗教思想比较研究》(主编:金京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及朝鲜族社会地位研究》(主编:金炳镐)、《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蒙古、美国国际合作关系研究》(主编:朴健一)、《韩语、朝鲜语、中国朝鲜语比较研究》(主编:姜熔泽)、《中国朝鲜族文学和韩半岛南北文学关系史》(主编:李元吉)、《东北朝鲜族地区基督教传播史》(主编:黄有福)、《中韩语言对比研究》(主编:太平武)、《中韩艺术交流史研究》(主编:朴永光)、《在华韩民族抗日斗争研究》(主编:康基柱)、《东北亚多元文化的区域冲突与融合——〈东医宝鉴〉对传统医学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主编:崔箭)、《20世纪50年代南北韩文学比较研究》(主编:金春仙)、《东西方政治价值的融合与冲突——韩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属性与发展逻辑》(主编:赵虎吉)、《在华、在日、在俄、在美朝鲜族文学比较研究》(主编:吴相顺)、《中韩文学比较研究》(主编:文日焕)。

《中韩文化交流丛书》内容涵盖了本中心对韩国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涉及政治、经济、语言文学等各方面内容,既包括对以往研究工作的概括与总结,也有对未来研究的探索与思考。本丛书各专题作者,皆为长期从事该方面教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有丰富的经验累积、深厚的韩国学理论研究功底,能够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理论观点,较好地完成各专题研究。部分分册即将陆续出版,准备在5年内完成。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推动我国对韩国学研究

的深化，能够为中韩两国友好合作发展与促进东北亚各国的和平友好、和谐发展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编者

2010年1月

自序

近几年，本人在中央民族大学主讲《朝鲜古代宗教与思想概论》、《韩国宗教文化概论》等课程。现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书是在上述课程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并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及比较分析方法，利用课余和暑期时间撰写而成的。

本书的第一章阐述了中韩原始宗教的主要思想、特点及作用并作了比较；第二章对中韩儒学（儒教）思想作了重点阐述并予以对比；第三章对中韩佛教思想作了重点论述并作了类比；第四章对中韩道教基本思想作了重点说明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第五章阐述了中（台湾地区）韩新兴宗教的主要思想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概括性的比较。在本书的最后附有相关的统计表，这些统计表对理解和研究中韩宗教思想的基本概况并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人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中国理论界和韩国思想界关于中韩原始宗教、儒学（儒教）、佛教、道教、新兴宗教等诸多的比较研究成果，如朱七星主编的《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思想比较研究》、郭齐勇著《中国儒学之基本精神》、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刘宗贤、蔡德贵主编的《当代东方大儒》、戴康生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马启成著《宗教与中国少数民族》、金勋著《韩国宗教源流与嬗变》等。此外，还参阅了韩国学者尹以钦教授编写的《韩

国宗教思想研究》(六卷本)、金洪喆著《韩国新宗教思想研究》、车柱环著《韩国道教思想研究》、金得幌著《韩国宗教思想史》等诸多著作和大量文章。

在这里需向广大读者说明的是,在这本书中没有撰写中韩基督教思想比较研究。这一专题主体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由于本人对中韩基督教思想的比较研究刚刚起步,尽管掌握了一些资料,但提炼的观点还不够成熟,有待在这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甦萍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尹以钦教授等专家和学者的指导和支持。在此谨向诸位学者及师长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并感谢家人长期以来给予我的多方的理解、支持和关照。

最后,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课题项目的出版资助,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协助,在此亦深表谢意。

2009年9月

绪 论

“中韩宗教思想比较研究”既是大题目又是新题目。它的“大”就“大”在其内容上。中、韩宗教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均有其悠久的历史。在这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丰富内容很难用区区几个章节能够叙述完整。它的“新”也一样，就“新”在其内容上。因为以前还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概括研究。因此，由我一个人做这个既“大”又“新”的题目着实感到不少压力。但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和比较研究又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而不愿放弃，就像手里攥着的奇石一样，尽管是沉甸甸的，但就不愿丢弃。所以，在同行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担起了此项重任。

我认为，要完成这一既“大”又“新”的题目，必须要认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韩国多宗教文化现象问题。韩国社会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除佛教、儒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式各样的新兴宗教。有学者说，世界上有什么宗教，韩国就有什么宗教。我本人虽然不敢苟同这一观点，但在韩国能够见到当今世界主要的各类历史宗教和新兴宗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韩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韩国宪法规定：一切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承认国教，政教分离。依据相关法规，任何宗教团体只要符合国家对宗教团体注册的要求，即可注册法人。按照韩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宗教团体可以注册为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因此，在韩国无论是传统宗教还是新兴宗教，其活动都非常活跃。他们均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每逢政治事件和一些社会问题成为焦点时，他们多表明各自的态度，借以赢得民众的信赖，争取信徒，扩大影响。韩国各宗教团体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创办了各类大专院校、

中小学和幼教机构；他们不同程度地从事经济活动，有的教会甚至已成为经济实力雄厚、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国际财团。同时，韩国宗教团体也积极创办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机构，出版了包括各种宗教书籍在内的各种书刊；设立了为数众多的医院、养老院、福利院。通过这些活动，各教团既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又争取了信徒，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韩国宗教不仅在国内传教，而且积极开展国外传教活动。到2002年7月止，有138个宗教团体向世界上75个国家派遣传教士10340人；同时，亦有许多外国宗教团体和几十个国家的1020名外国宣教师在韩国传教，显示出国内外多元发展的趋势。综上所述，我们大致概括出韩国宗教的现状和一般特点：“多”是韩国宗教现状的第一个特点。韩国宗教数量多、形式多、活动多。仅就数量来讲：根据韩国文化观光部宗务室于2002年12月公布的《韩国宗教现状》统计资料，目前佛教教团共有106个，僧侣41232人，信徒37084795人；基督教教团共有170个，神职人员79023人，信徒15200101人；天主教教团共有15个，神职人员12366人，信徒4278032人；儒教教团（乡校数量）共有730个，神职人员31833人，信徒6004470人；天道教教团（乡校数量）共有283个，神职人员5670人，信徒996721人；圆佛教教团（乡校数量）520个，神职人员2455人，信徒1337227人；大佛教教团（乡校数量）109个，神职人员358人，信徒477342人；其他宗教教团44个，神职人员280685人，信徒12841720人。1997年受韩国政府文化体育部委托，圆光大学宗教问题研究所对新宗教进行了深入综合调查，据统计当代韩国自生新宗教有12系列133个教团，佛教系有7系列56个教团，基督教系有12系列123个教团，其他宗教有3系列36个教团，共350个教团。可见，韩国是名副其实的“多”宗教国家。“杂”是韩国宗教现状的第二个特点。韩国宗教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地下的；有的组织是严密的，有的组织是松散的；有的组织是长期的，有的组织是短期的。“活”是韩国宗教现状的第三个特点。韩国宗教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活跃的，不是呆板的；不只是向“内”的，它尤向“外”，韩国宗教始终是面对世界的，不止面对个别地域。因此，我们对韩国宗教的认识和态度应从上述现

状和特点出发，从变化发展着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某种既定的原则和规则出发。

我们认为，韩国宗教之所以显示出上述基本特点，可以说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这同韩国的宗教政策有直接的关系。韩国宪法第 11 条规定，全体公民（包括信教公民在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是平等的；第 12 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国家不承认国教、实行政教分离。所以，在韩国任何宗教都得到国家强有力的保护。这是韩国宗教蓬勃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国家和社会对宗教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认识。从韩国宗教发展史角度看，历史上的韩国传统宗教的主流是“护国”性的。因为具有“护国”性，每个朝代的统治阶级对传统宗教的立场和政策不是对立性的、敌对性的，而是根据不同的需要采取了或扶持或限制或利用的立场和政策。韩国僧侣、信教徒在历史上的反侵略战争中显示出来的英勇行为和斗争精神是有案可查的，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在这里进行具体阐述。因为韩国传统宗教在其历史上的主流是积极的、向上的、护国的，所以国家和社会对传统宗教采取的是肯定和保护的态度。再从新兴宗教（不包括国家颁布的邪教）的性质和社会职能以及对社会的作用来看，新兴宗教主张“爱国爱族”，强调“互助互爱”，促进“稳定和谐”，推动“社会福利”，关爱“残疾老幼”，建设“一个世界”等。可见，新兴宗教也具有明显的爱国爱族爱教性质。所以在韩国，某个宗教的建立只要对社会环境和发展有利、没有负面影响，均得到国家的认可，允许它自然发展。

第二，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因为撰写这一题目首先涉及或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阻力，进而影响撰写效果，更是影响撰写计划的实施和完成。

在中国，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曾就这个问题发生过争论。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唐君毅、牟宗三、钱穆、杜维明、刘

述先等当代新儒家认为，儒学是“人文的宗教”或“道德的宗教”^①。当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在历史上起过“准宗教”的作用^②。著名大学者任继愈先生则一直坚持“儒学是宗教”的观点。中国著名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曾经说过：“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以及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能称之为‘儒学’，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后来孔子被神化了，“到了唐代，儒、释、道三家就并称为三教。到了建圣庙，举行祭祀，儒家已完全成为一个宗教”^③。李申著《中国儒教史》则系统全面地阐明了儒学即是宗教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也有否定上述观点的学者。首先，冯友兰先生就持不同观点，他说：“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有一个主……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人的精神若达到儒家的高度，宗教就对他失去作用^④。著名宗教学家牟钟鉴先生在《探索宗教》中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但它不是宗教”^⑤。除此之外，还有蔡尚思、郭齐勇等人也明确表示儒学不是宗教。在何克让、李国权两人合作的《儒教质疑》^⑥和崔大华的《“儒教”辨》^⑦，均反对儒学是宗教。据了解国内有很多学者不同意儒学是宗教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儒教”之“教”，是教化之“教”、名教之“教”、学说之“教”，而非宗教之“教”。他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一种信仰的学说体系，有教主、教义、教规、经典，随其发展还会有教派，而这些儒学都不具备。且儒学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的天国。

那么韩国学术界是何种状况呢？在这里，就韩国学术界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予以概括。可以说，在韩国学术界对此问题

① 郭齐勇：《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载《中国哲学史》，1991年第一期。

② 李泽厚：《再谈实用理性》，载《原道》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③ 季羨林：《儒学？儒教？》，载《文史哲》1998年第三期。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底蕴精神》，载《冯友兰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448页。

⑤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⑦ 《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

同中国学术界一样也存在不同的看法。韩国儒学大家柳承国先生主张“儒教并非宗教教理，而是一套生活规范、伦理思想”^①。他还认为，韩国儒教的主轴是孔子的人道主义精神。韩国另一位著名学者、成均馆前馆长崔根德则主张，“儒学是一种立足于现实，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它具有：尊圣人为万世师表；运用超越时空的大经大法，提示人类终极问题的解决点；实现个人及社会理想的一以贯之的信仰体系；四礼等一整套仪式；排斥异端的威严等特点^②。韩国著名宗教理论学家尹以钦、首尔大学琴章泰教授等诸多教授均认为，在韩国儒学是宗教，是“伦理宗教”、“生活宗教”。

在韩国除了上述对立观点之外，还有学者持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

我们认为，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总有其根本原因的。造成上述各类不同观点的根本原因应到儒家思想体系本身当中去找。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宗教观的创建者。中国学者牟钟鉴说：孔子“并不废除宗教，他采取的是改良的态度，保留传统的天命论，但消除天神的人格特征，使之抽象化为命运之天、义利之天，又进一步限制天命的作用，把仁德修养、智慧积累、事业开拓放置在人的主观能动性支配之下，人生一定要尽人事，人事未尽，不可以言命。孔子还主张保留传统的宗教祭祀典制与活动，但不正面回答有无鬼神的问题，却要求人们对鬼神诚敬，以发挥神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孔子走了一条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的路，神道的形式，人道的立场，神道的手段，人道的目的”^③。这就是说，儒教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确有交错的地方”，而且“儒家经典中的礼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研究祭祀和丧礼的，它是传统宗教的理论基础”。可见，儒学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又具有非宗教性。日本学者加地神行在《何为儒教》一书中提到，儒教的宗教性在生死观与祭礼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宗教中若除去伦理道德，

① 柳承国著，姜日天、朴光海等译：《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② 《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卷首语，学苑出版社，1998年。

③ 牟钟鉴：《探索宗教》，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3页。

则还剩下什么？只会剩下生与死的问题……所谓宗教是解释死以及死后的问题”。并认为，“儒教是以招魂仪式这一东西古今都存在的咒术来构成的生命观，在解除人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方面树立了很成功的范例”^①。韩国学者崔英辰在“儒教的超越性与神观”中指出，“超越性才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的本质所在”，“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学者认为儒教是世俗的伦理规范，缺乏超越性……但这不过是一面之词。儒教思想的定位点在于上帝、天、太极、理等超越性的存在……儒教超越性的世界的概念是神。神本来是天神、地祇、人鬼，即包括一切自然神和祖上神的概念。这种神的概念经过了多种变化过程，直到《周易》的十翼以及《中庸》才形成了表示超越性境地的概念”^②。从中日韩学者的观点中可以了解到，他们在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是因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自身的内容所造成的，就是说，不同的观点均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找到其理论依据。

中国有学者以此为依据，主张“儒学儒教一体化”论。山东社会科学院刘宗贤和蔡德贵就主张，“儒学儒教一体化，儒学儒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儒学儒教一体化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儒学”。他们认为，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在其思想中，既有“学”又有“教”，“关于孔子和其他儒家代表人物的‘学’似乎不用多说，所有学者都注意到了，而且其‘教’很多人是不承认的……事实上，孔子的思想中，确有宗教因素，不注意是不对的”。孔子说：“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孟子也认为，天命是人伦道德的根源；荀子承认上帝的存在，如说“皇天降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齐物”。董仲舒为把儒学改造成儒教、建立中国的宗教尽了巨大的努力。他试图建立起“天”的绝对权威，要建立神权与王权的联系，而用尽了毕生的精力。韩愈作为儒家学者也承认“上天临临”，“天地神祇，照布森列，非可诬也”，他甚至相信鬼神、妖怪的存在。那

① 崔英辰著，邢丽菊译：《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424页。

② 崔英辰：《易传中神的问题》，载《公洲师范大学论文集》第21辑，1983年，第171—176页。

么在朱熹思想中有没有宗教性的内容存在呢？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家，这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不管是在儒家学者的思想中还是在儒家经典中确实实地存在宗教性因素。

综上所述，在“儒教是否宗教”的问题上，之所以存在严重分歧是由儒家思想体系本身造成的，这应该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在中国和韩国均存在十分相似的状况，但细分析起来也有很大的不同。如中国学界在这一问题上，持“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并不多，但在韩国学界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主张“儒学是宗教”的观点不是少数，而是多数。这是由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不同思维、不同认识等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韩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儒教作为宗教没有超越的信仰对象，一个神或上帝；也没有预设天堂和地狱；也不讲前生和来世；更没有涉及超验的灵魂救助问题。但它有明确的原理，为人们的健全生活提供了精神规范，更有宗教经典，在韩国社会儒教信徒组成了有体系的组织，且具相当规模。设有特定的宗教场所，如成均馆、文庙及其各类乡校等，并定期举办相关仪式和活动。据 1999 年韩国儒教团体统计，韩国有儒教教堂 730 所、教职人员 31833 人、信徒 6004470 人，在佛教、基督教之后居第三位。另据韩国文化观光部《韩国宗教现况（2002）》统计，到 2002 年 7 月止，有儒教财团法人 17 个，社团法人 4 个，信徒 600 万人，全国乡校 730（包括私塾）所。同时，韩国儒教信徒团体有儒道会、青年儒林会、妇女儒林会、儒教学会等。出版定期刊物 3 种。按照这些统计，韩国儒教似乎弱于佛教、基督教，乃至天主教。其实不然。据首尔大学尹以钦教授调查，实际上在回答“无宗教信仰”的人当中，91% 是生活在儒教信念体系影响之下的“实践性儒教人”。这就是说，儒教价值已经成为一般民众生活的精神支柱。1985 年 1 月成立的儒教学会是韩国儒学界的权威学会。在其《儒教学会报》创刊号中，明确提出了儒教现代化的四大原则，即儒教宗教化、孔孟化、韩国化、大众化。同时，学会开展实践研究、定期召开学术会议、进行道义巡回讲演、举行儒教经典讲读会等活动。还有不少学会和纪念事业会，如孔子学会、礼学会、周易学会、李谷学会、艮斋学会等，积极开展学术